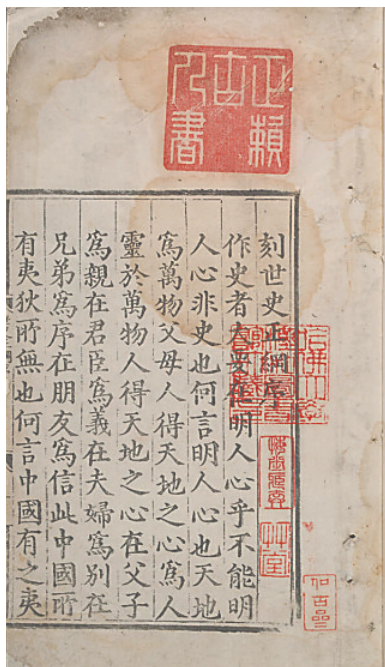


编者按

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主题为“阅读：通往未来的桥梁”，倡导通过阅读开拓视野、传递智慧，为人类共建更美好的明天。

明代琼州先贤丘濬无书不读、无时不读，是海南历史上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不但官阶最高、著述最多，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见解甚至超前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

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者何杰华新书《国士丘濬》3月问世后，社会反响良好。在今年读书日到来之前，海南日报文化周刊特约何杰华撰文介绍丘濬的读书之道。



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上的丘濬塑像。

李幸璜 摄

## 经典如何传后世？

■ 远襄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明代于谦《观书》中的诗句，恰似推开雕花漏窗，让典籍沉香漫过时空。当指尖轻抚泛黄书页，时光编织的文字密码便在竹简、缣帛与纸张间流转生辉。中国藏书传统源远流长，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这“藏室”正是最早的官方藏书机构，开启了中国藏书文化的先河。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典籍。其中，《诗经》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被称为“诗三百”。《诗经》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是研究先秦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与之齐名的《尚书》，是汉代以前文献的汇编，收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诏书、诗歌等，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

汉代承袭秦制，《汉书·艺文志》中详载“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等皇家藏书楼。东汉兰台藏书更为完备，班固任“兰台令史”时，不仅在此完成《汉书》的编撰，更开创性地编纂了《汉书·艺文志》，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尤为突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汉书》并称“史汉”，成为后世史学研究的基石。

魏晋南北朝虽战乱频仍，典籍整理却从未中断。据《隋书·经籍志》所述，三国时魏秘书监郑默编制《中经》，晋著作郎李充创《四部目录》，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体系。

隋代，秘书监牛弘“派人到民间搜集书籍三万卷”，在东都建立观文殿专藏典籍。

唐代崇文馆、弘文馆藏书之丰富，令刘知几等学者得以博览群书，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北宋太宗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宋会要辑稿》记载其“藏书八万卷”，成为当时的知识宝库。

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活字印刷术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效果，为后世研究印刷术提供了宝贵资料。沈括还创制了“十二气历”，有利于安排农时。郭守敬主持了元朝全国规模的天文测量工作，编写了《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一项卓越成就，也体现了当时中国科技的水平。

明清私家藏书尤为鼎盛。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历代藏书家事迹，明代毛晋汲古阁藏书八万卷，多为宋元珍本；范钦建造的天一阁“藏书七万余卷”，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规，使得这座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保存至今。

清代，黄丕烈得到宋版《陶渊明集》后，特筑“陶陶室”珍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得一奇书，辄焚香肃拜”的记载，尽显藏书家虔诚；孙从添《藏书纪要》提出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八法，系统总结了古籍保护经验。

现代图书馆事业初始于清末，据《张元济年谱》记载，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时，曾言“为国家谋文化之建设”而广搜典籍。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开始筹建，《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记载了首任馆长缪荃孙“手订章程，亲为采访”，为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

学者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无锡图书馆：“虽简陋，然藏书已逾万卷，余每日必往。”这朴素的记述，道出了图书馆对求知者的重要意义。

如今，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修复工程，遵循《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让珍贵文献重焕生机。而线上的数字图书馆使敦煌遗书在云端展开残卷，让《四库全书》在数字平台重现光彩，诸多典籍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我们展卷阅读时，仿佛能听见孔子“韦编三绝”时竹简摩擦的簌簌声，看见李清照“赌书消得泼茶香”的雅趣。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文之为德也大矣”，这绵延不绝的墨香，正是文明传承最生动的注脚。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史志琼崖

# 国士丘濬的读书秘诀

既要『博杂』，又要『精约』

何杰华

传说百里借《汉书》

“如此恩封岭海无，家居况在海南隅。乡人问我缘何得，世积阴功子读书。”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十月，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写下这首《受一品封》，以答谢众人的祝贺，并回应众人对他“缘何得”“如此恩封”的疑问。他把这一切荣耀与成就归功于两件事：积阴功与好读书。

四十年前的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获殿试二甲第一，与另外十七位同科进士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对于丘濬而言，这一职位对他最大的诱惑便是可以“读书秘阁”。这对于小时候无书可读的丘濬来说，无疑是天降的幸福。

一日，翰林院内众人齐聚于史馆，丘濬及座师修撰李绍、编修刘定之等也在场。大家正聊得兴起，李绍忽然指着刘定之问丘濬：刘定之生长于江西这样人才辈出之名邦，又不乏名师指教，他的学问自然是浩博精深，而你生于偏远的海南，你从哪儿去获得可读之书呢？哪能有什么厉害的老师可以教导你呢？你是如何做到学问如此博洽的呢？

丘濬在《南溟奇甸赋》中认真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把这一切归功于教化的推行、公序良俗的熏陶，他说如今的琼州琴乐之声处处可闻，礼乐文明“彬彬然盛矣”，这里只是起步得晚，琼州学子的知耻而后勇，让荒岛变奇甸。

年幼时，丘濬已经有了自己的代表作《五指参天》，被乡人称为神童，但他不这么认为，甚至觉得自己天资平平：“不幸稟此凡下之资，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虽业儒，然幼失所怙，家贫力弱，不能负笈担簦以北学于中国。”父亲丘传早逝，家中的藏书便所存无几，乡邻借去的，大多也难再追回，尚存的又因海南岛潮湿多虫“往往编残字缺”。丘濬和兄长丘源也去城内的书市里找过书，希望能买入或是借到一些值得读的好书，但书市多是些“俚俗驳杂之说”，二人总难如愿。于是，丘濬只得找亲戚朋友借，借后再抄录，以便时常温习，但借书也不总是顺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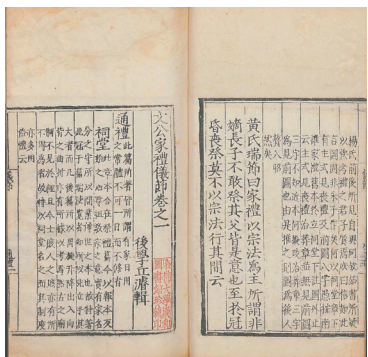
《明史》里便有这样的一条记载：“（丘濬）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这条读起来略“硬”的记载，在乡人的口中就变得生动多了。时人把它编成一则故事，故事名为《十岁百里借〈汉书〉》，说十岁的丘濬想读《汉书》，于是向老师要了封介绍信，想去找老师的一位姜姓朋友借这本书。

然而，这位姜姓朋友的住所不在百里之外，步行至少得三天三夜，丘母不放心，但毕竟书香门第，自然还是会支持这样的好学之举的，于是便给丘濬烙好了饼，送他远行。到达姜家时，主人给丘濬出了一个上联让他对，说如果他得上联便借。

姜先生端坐于院内照壁前的石凳上，出了上联：“墙壁当前，龙不飞，凤不舞，桃不开花，梨不结果，可笑小子。”小丘濬从容不迫，对出下联：“棋盘之中，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兵无良草，敢杀将军。”姜先生听后，连连捧出《汉书》，并邀请他常来看书、借书。

这则民间故事不但在海南民间广为流传，还被辑入《中国历代神童：元、明、清朝卷》一书。

在丘濬的记忆里，他因借书经历的困难不少，有时候为了借到一本书，低声下气是在所难免的，甚至会因反复求于他人而被厌烦、被笑“痴或迂”。



丘濬最先辑录的《文公家礼仪礼》书影。 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脱胎于丘濬《大学衍义补·慎刑宪》的日本《无刑录》。 日本最高裁判所图书馆藏

传授读书之法

丘濬嗜书是旁人无法比的，只要是书，只要不是那些“俚俗驳杂之说”，只要能借到，他都肯下功夫阅读。但有时候没得挑，三教百家之言，他也无不涉猎。但只是一味苦读，不得要领，却也难有所成。丘濬“有所成”，得益于他“会读书”。

成化五年（1469年）三月初七日，丘母去世。丘濬在京师槐阴书屋收到噩耗时，已是秋日。待到丘濬一家四口赶回琼山老家时，已是成化六年了。守孝期间，丘濬想起自己一桩未了的心愿，那便是为自己的家乡建一藏书之所——“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购书籍以度藏于学宫，俾吾乡后生小子，苟有志于问学者，于此取资焉。无若予求书之难，庶几后有所起者乎。”

淋过雨的人懂得给别人撑伞。少时吃够了无书可读之苦、受够了因借书而遭致的白眼冷语，“翰林院之问”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要跨越成见这座大山，靠的只能是自强不息。不论丘濬如何能言善辩，琼州文教窘迫仍是显而易见：这里甚至没有过什么藏书家，官方藏书也是捉襟见肘。元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任琼州府学学正的符元裔就曾无奈地感叹：“我为正于学，而学无藏书以备学者之求，我职为有愧矣。”府学都如此，更不必谈州学、县学了。

成化八年（1472年）正月，藏书石室动工兴建，次年七月落成，丘濬又将自己的部分藏书藏于石室，包括他抄录的那两套珍贵的古籍《曲江集》和《武溪集》。

丘濬还写了《藏书石室记》，首先强调了书的重要性，说书是了解天地万物的媒介，劝琼州后生们要多读书，不仅要读科举必考书目，各类传记、史书及诸子百家的典籍也都要勤读。他还分享了自己读书的窍门——“博杂”和“精约”。

这是丘濬数十年来读书的切身体会 and 心得。他之所以能成为“学识博涉”之人，首先是因为读书“博杂”，正是因为“自六经诸史九流笺疏之书，古今词人之诗文，下至医卜老释之说，靡不探究”，才使得他一个生于无书可读又无名师可从的南荒之人成为翰林院中的佼佼者，更是最终成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丘濬所说的“博杂”的“博”，即多而广，同时“杂”应无门户之见。正是在这种如大海不拒细流的读书态度下，丘濬将各个学科知识完成了贯通。这使得他看问题能更全面，解决起问题来更能切中问题的本质。

除了“博杂”，丘濬还主张：“学必由约，而后可以致于博，精而约之，以尽其多与博。”这里的“精”是专注与深入，“约”则是概括出精要。如何做到又精又博？其实这是个很困扰读书人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要做到精专，势必就会丢掉博杂。同理，要做到博杂，就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去实现精专。丘濬在这里给出的“约”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概括地说，读书时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内容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便是精读，精读便是专注深入地读，一字一句认真地读，不放过任何细节，不忽略任何情节。这种方法最耗精力却也是最有效，适用于与自己学习研究的专业关联的书。这类书需要通过精读去咀嚼、去吸纳，以帮助自己建构、夯实或丰盛知识体系。

第二种便是粗读，结合丘濬所提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约读”。粗读当然不是指潦草地读，其关键在于提纲挈领、概取精要。这种方法最是适合读一些与自己学习研究的专业关联的书。

第三种便是“挑着读”。这种读法适用于工具书。方志、实录、百科、手册之类的工具书，是不需要逐字逐句去读的。

“约读”“挑着读”既能实现“博杂”，又能节省出时间和精力实现必要的“精读”，这便是丘濬在《藏书石室记》里分享给琼山后学的读书心得。他们对他充满期待，希望他们的学问和见识都能借此石室、凭着读书逐渐深远、宏大。他说，他只是遗憾自己老了，怕是不能看到琼山后生们未来的盛景了。但他忽又笔锋一转：“虽然，冥漠之中，无知则已，万一有知，亦将畅然快，然笑也。”

丘濬最爱读什么书？

若要问丘濬最爱读哪类书，“朱子理学”会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毕竟他是常以“理学卫道士”自居的。他自年少备考时便开始正式接触程朱理学，稍长后得遇程门后裔、琼州知府程莹点拨，到国子监又蒙萧镈等恩师指教，再到翰林院里的自我打磨，历经数十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丘氏理学”且根深叶茂。

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已成为官方所尊崇的正统和主导思想。然而，当这种“正统”和“主导”更多地甚至仅表现在科举考试的运用上，而非用于推动社会发展与思想进步时，程朱理学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取仕和求仕的工具，导致其功利性激增，而思想性日益消退，进而逐渐僵化和教条化。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科举考生们以为找到了通往仕途的捷径，因此，他们只从所要考的经书中摘取只言片语，而不愿花力气去研读原典，更不必说去博览群经了。这种发展态势下的程朱理学，自然会遭到部分“清醒”的精英们的批评与非议。丘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也看到了程朱理学面临的困境。作为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说的拥护者，他需要站出来卫道。

天顺七年正月，丘濬的理学著作《朱子学的》完稿付梓，丘濬此书后序里强调了“持敬”应从“外”到“内”的必要性，极力主张要高度重视外在学习，强调要先实实在在地学习圣贤之书，再去谈内在修养的提升。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如果内外倒置，先“内”后“外”，就可能导致一些学者在学习时无从下手，最终迷失方向，圣贤之学就变成了怪诞之学、玄虚之学。

成化十年二月，他又完成了一部理学著作《家礼仪节》。这是继《朱子学的》后，又一本与朱子理学直接相关的著作。

丘濬对朱子理学的学习与研究，不单停留在对理学正统的守护及理学要义的阐发上，更体现在对它的革新上。这一点，在他的《世史正纲》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成化十七年二月，丘濬创作完成他的史学著作《世史正纲》，这部书的创作与他参与修订《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有关。这次修订，让他得以更为深入地钻研朱熹所作的《资治通鉴纲目》，也让他发现了该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用意深而立例严，非贤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鲜”。很显然，这与“经世济用”的著书目的相悖。任何思想要作用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首先做到的便是普及，继而才能赢得充分的群众基础。于是，丘濬借《世史正纲》完成了“革命”，将这本书写成了“示夫当世之学生小子”之书，在守护正统的同时，兼顾了普及和传播的需求。

自然，更为世人所熟知的、他的扛鼎之作《大学衍义补》则更是少不了摘引朱子语录、阐发朱子理学之精髓。在此之前，他自然要精读和深究《大学》和《大学衍义》等前人留下的经典著述。

丘濬，从一名海南学子成长为一名泱泱大国的辅政之臣，从一名“临高医学训科”的小孙子成长为内阁大学士，从一名琼州府学的学子成长为策划出一部伟大的治国方略的“第一流人物”，最终成为一代国士，这一切，几乎都与他“好读书”“会读书”密不可分。值此读书日，借他劝勉当时太子的一诗赠与各位读者：“光阴驹过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虚度，经书好用心。”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